



置身神農的田園*

In the Fields of Shennong

胡司德 (Roel Sterckx) **

—

在一封署於 1886 年 10 月 11 日寫給劍橋大學校長的信中，甫將自己超過四千冊的漢籍藏書捐贈劍橋大學圖書館的威妥瑪爵士 (Sir Thomas Wade, 1818-1895) 寫道，有人告訴他，「劍橋大學或將因應情勢設置漢學教授，(我) 則有可能被徵詢出任的意願」。作為翻譯家和外交官在中國度過了近四十年歲月的威妥瑪，對在劍橋設置漢學講座的前景持謹慎的態度，是有其理由的，畢竟當威妥瑪回到英國時，他已接近七十歲了。他寫道「這一想法並未完全被拒絕，但它的誘因實在不怎麼樣」。威妥瑪在信中又說，由於事情沒什麼進展，「當局認為，也許我願意無償擔任漢學講座教授」。¹ 兩年後，年輕時從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 退學，並被父親認為不適合學術界、因而被送去從軍的威妥瑪爵士，在 1888 年 4 月 21 日獲選為劍橋大學首任漢學教授。他沒有領薪水，他的繼任者翟理斯 (Herbert Giles, 1845-1935) 也是到就任兩年後才支領薪酬。

在那段時期，將威妥瑪所謂的「中國的東西」(“Res Sinica”) 介紹給學術界的機會微乎其微。一直要到 1903 年，漢學才在翟理斯任內被完全認可為榮譽學位考試 (Tripos examination) 的科目，正式成爲一個本科專業。² 與當時學術界的同行不同的是，漢學的先驅者被看作「中國通」(“Old China hands”)，即他們關於中國的知識並非來自圖書館，而是通過長時間親歷實地的政治、外交與傳教工作。但這一事實對這些先驅者想將中文與漢學研究設置為大學課程的企圖而言，並無太大幫助。³ 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作為中國通的這一特質，可能讓他們的學術取徑看來不夠嚴謹；他們在大學社群中有如棄兒的地位，更和他們最終在漢學史上得享之大名有雲泥之別：在西方漢學出版品中以為標準，沿用至 1980 年代的羅馬拼音系統，即命名為威妥瑪—翟理斯拼音 (Wade-Giles system)。

無巧不巧，正好一甲子後，在一份署於 1948 年 5 月 15 日，並在三天後寄至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草案中，聲譽卓著的生化學家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 本文為作者就任劍橋大學新設之李約瑟漢學講座教授的演說詞 (2008 年 9 月 30 日)，由傅揚 (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生) 翻譯。

** 劍橋大學東亞系李約瑟漢學講座教授 (Joseph Needham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 Charles Aylmer, “Sir Thomas Wade and the Centenary of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1888-1988),” 《漢學研究》7: 2 (1989): 408-409。關於劍橋漢學的歷史發展，亦可參考 David L. McMullen,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Wide-Ranging Scholarship from a Doubtful Start,” *The Magazine of the Cambridge Society* 37 (1995-96), pp. 62-66; 闕維民, 〈劍橋漢學的形成與發展〉, 《漢學研究通訊》21: 1 (2002. 2): 31-43; 傅勇, 〈劍橋漢學管窺〉, 《中國文化研究》2004.2: 148-151。

2 Charles Aylmer, “The Memoirs of H. A. Giles,” *East Asian History* 13-14 (1997), p. 43.

3 翟理斯於 1897 年，因其對漢學研究的貢獻而被 Aberdeen 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對此，他在回憶錄中特別指出，這件事是一眾所周知的特例：「倘若我是編訂一部希臘戲劇，或甚至討論 (‘π ρ ο ζ’ [pros]) 作為副詞的價值，沒有什麼學術高度 (無論多麼令人目眩神迷)，我就無法達到這樣高的水準。」引自 Charles Aylmer, “The Memoirs of H. A. Giles,” p. 37。

向委員會提議了一個題為「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計畫。它的讀者「不是漢學家或一般大眾，而是所有受教育的人；是對科學史、科學思想史和科技史，以及它們與整體的文明史之關係、特別中國與歐洲發展之比較有興趣的人（無論是不是科學家）」。⁴ 李約瑟承諾他將以一巨冊完成任務，這個想法會讓今天出版社的某些委員浮出一絲苦笑，因為此計畫現在已出版了二十四卷大部頭的分冊。在同時代人之間，李約瑟對中國的興趣並非沒有引起爭議，但隨著他致志於學習與寫作中國的種種，他對中國的興趣終得到堅實的認可。李約瑟之所以發現中國，最初是來自於他對年輕中國女科學家魯桂珍（1904-1991）的感情。魯桂珍在中國受戰爭撕裂時來到劍橋，則是為了和時任教授與中英科學合作館（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館長的李約瑟共事。

以上介紹足可說明，促成劍橋漢學得以卓越頂尖的前人，是經由不平凡且往往艱辛的道路才得以走向中國研究。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學者，如今天蒞臨、我也十分尊敬的魯惟一（Michael Loewe）博士。他們在中國研究的領域裡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劍橋印記；無論在東方或西方，他們的名字和著述也成為任何對中國有學術興趣的人的基本詞彙。無巧不成書，在李約瑟那封信又一甲子後，我們今天有理由慶賀雙喜臨門。不僅因為我很榮幸能擔任的這個講座得到永久的資金，還在於它永遠與一位貢獻厥偉，使中國在劍橋有一席之地，並讓中文世界認識劍橋的學者的名字相結合。對此，我們向該講座教授一職的捐贈者致上誠摯謝意，在未來的幾個世代，他們的慷慨將促成劍橋的中國研究開花結果。

自威妥瑪、翟理斯和李約瑟發其端倪以來，時代已經變了。我首先要鬆一口氣，因為漢學講座教授是有薪水的。但更重要的是，漢學家工作於其中的世界已徹底改頭換面了。令人欣慰的是，晚至 1950 年代還會在一些劍橋高桌上（high tables）碰見的刻板印象（如一位傑出的前任漢學教授在就職演說中指出的，認為「中國是上下倒錯和左右顛倒的國度」，中國人「說話像在唱歌」）已經不常見了。⁵

今天沿著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穿過劍橋的人，會看到一塊白色花崗石碑，上頭刻著徐志摩（1897-1931）的中文詩作。這位浪漫詩人在 1920 年代初來劍橋讀書，並在別處稱劍橋（康橋）「是我難得的知己」⁶（現在國王學院的院士還會用中文請遊客不要踐踏草地）。在我們慶賀講座教授一職捐贈的幾周前，中國因為將主辦奧運而成為焦點；再往前推幾個月，大英博物館因秦始皇的展覽，吸引了館史上最多的觀覽人次；⁷ 此時此刻，中國也成為除英國外，劍橋大學學生的最大來源。⁸

公眾對中國的知識需求有飛躍性的成長，以致單憑自費自力的業餘愛好者的學術奉獻已有所不足（幸運的是，仍然有一些這種人）。在今天，對於中國的學術研究已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一個專職的事業。和我的許多老師不同的是，我們這個世代的學子享有專門且完整的學位課程，並有許多前述先驅者所留下的、有救命之功的參考著作。

在劍橋，漢學家不復孤獨，也不再被要求具備從唐詩格律到當代上海都市計畫都無所不包的知識。我可以很高興地說，此時此刻無論男女，都能在周遭找到學有專精的同儕，大家皆以各自的方式，從不同方面進行細

4 見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archives, SCC3/3/1, 引自 Simon Winchester,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8), pp. 170-172。

5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An Inaugural Lecture by E. G. Pulleyblank, Professor of Chinese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5.

6 見〈康橋再會吧〉。關於徐志摩在劍橋的情形，見劉洪濤，《徐志摩與劍橋大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7）。

7 “The First Emperor: China's Terracotta Army,” 展覽期間為 2007 年 9 月 13 日至 2008 年 4 月 6 日，吸引了超過 850000 名觀覽人次。展覽的目錄見 Jane Portal, *The First Emperor: China's Terracotta Arm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7)。

8 據 *University Reporter* 138.9 (22 January 2008) (Special Issue, Student Numbers 2006-2007), p. 23, 申請全時學位課程的學生中，總計有 702 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69 人來自臺灣，61 人來自香港，151 人來自新加坡。

部研究，增進我們關於中國的知識。如今，語言學家、文學學者和歷史學家能夠以社會科學作品為參照，檢測他們的假說；我們得以接觸別人的圖書館，而電子圖書館和資料庫則藉由訊息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找上我們；威妥瑪捐給劍橋的圖書（翟理斯曾希望能加以編目）很快也會完成電子化，人們將可利用漢字進行搜尋、檢索。⁹

每個人的取徑或有不同，但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理解中國。

二

至此已很清楚的是，中國研究者所面對的任務是頗富挑戰性的。理解中國的這番事業，比委任一位個別學者及談論其個人研究計畫遠為複雜，當然也更加有意思。

但若把新挑戰簡單地歸因於中國在現代世界舞臺上快速飆升的能見度，或是歸因於可使用之新材料的持續增加，其實是不正確的。新材料確實可以點燃新的研究方向，但它們本身並不能構成有原創性的思想。

對於理解中國的過去，近來已有了引人入勝的新進展。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考慮這些新發現和新取徑時，它們背後長期存在的舊觀念和學術迷思（myth）。最能清楚顯示這點的，也許是以下我要談的古代中國的研究。

孔子（公元前 6 至 5 世紀）所處的古典時代（classical age），以及由此以降的古代秦漢帝國，在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想發展史上，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在這段時期，中國漸從封建城邦的聯邦體制，演進為一個統一帝國（公元前 221 年），目睹了經典和哲學家的出現，並

見證了通俗和軼聞文學的誕生以及史學、法律與行政記錄保存方式的發展。毫無疑問，在這一階段出現且影響延及未來數世紀中國文明的基礎文本和哲學家，曾吸引了早期的評論家和翻譯家研究此一時期，如萊布尼茲（Leibniz, 1646-1716）、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和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

這段時期畢竟是中國史上的決定性時刻，便宜行事地看，它相當於柏拉圖（Plato, 約 427-347 BC）、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和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所在的古典世代，約略終於羅馬共和晚期（Late Republic）和奧古斯都（Augustus, 63 BC-14 AD）之初。帝國和皇權的模範形塑於此時，對理解 20 世紀初中國的政治命運，它們仍有著萬能鑰匙（passepartout）的作用。此外，這些變化也被認為是以偉大哲學家的思想風貌為背景所發生的：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往往被整齊地區分為不同「學派」（schools）的思想家及其門徒。

但這些與由帝國中央所驅動的經史典籍相結合、表面上顯而易見的相似性，也製造出一些關於中國文明至今猶存的迷思。對此，我將分享一些思考，而中國上古的一位文化英雄可以幫助我踏出第一步：神農。

在下至公元前 2 世紀的古代文獻中，神農被描繪為一個中央權力式微的帝國格局下的小邦國領袖，他親力耕作，其統治無需官員、法律或刑罰便取得了普世性的和平。在政治神話中，他成為黃帝的一名對抗者，並頗富傳奇性地反對透過軍事力量和刑罰以遂行統治的觀念。¹⁰ 和傳說中發明卦爻、啟發中國文字形成的伏羲一起（稍後將再談關於文字的問題），神農呈現出一個模範教師的形象，不言而教且在無所察覺的狀態下臨事聽政。對哲學家來說，神農體現了一個以農為本，類無政

9 威妥瑪和翟理斯的關係看來不怎麼好。翟理斯的看法，從他在一篇他人讚揚威妥瑪《語言自邇集》的書評上信手寫下的評論中可以清楚看見（根據翟理斯，此書評發表於 *China Review* XVI, 1888, p. 214）。他說：「一個故事在沒有比較對象前總是好的。他（即威妥瑪）除了讓自己成為笑柄的愚昧、迂腐的中國史講座外，再沒多做些什麼了。他甚至沒將圖書編目。」這一留有真跡的書評黏在現正由我保管、翟理斯個人的《語言自邇集》（出版於 1886 年）扉頁上。

10 Mark Edward Lewis,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pp. 174-179; Michael Puett, *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82-185.

府主義和原始烏托邦社群的理想。¹¹ 對土地上的農民而言，神農則代表一個神靈，在豐收時節與年度耕田禮時得享祭祀和牲醴。¹²

除了是農業的守護者，神農也達成了其他成就。在醫學的傳統中，神農稱得上是傳奇的醫藥藥性實驗之父：他親嘗百草並教導人民避開一些特定的植物（情操高尚的他常因此一日內中毒七十次）。¹³ 在漢代圖像中（見左下圖，出自山東武梁祠），神農在田地裡以犁耕作，這使他有資格成為農業科技之父。在種種化身中，神農也被認可為市場的創立者。根據《易·繫辭》，他「日中為市」，匯集全天下的人民與貨物，使人們可以有易無，換取需要的物品，最後「交易而退，各得其所」。¹⁴

我應該就此打住，不再絮說神農其他林林總總的才能。已頗為清楚的是，在這些關於起源的敘事中，神農這號人物代表了千纏萬結的諸般成就與文化活動，從上



層的政治哲學到飼料的發明皆包羅其中。但若我們自我設限，在理解如神農這類人物多面且複雜的表現時僅停留在帝國經典的宏大敘事上，我們將難以碰觸到如此多樣化的形象。這一斷語亦可適用於中國上

古的其他諸多文化英雄。我的論點是，這位農業始祖的例子（當然還有一長串其他例子），使我們對許多解釋傳統中國的論述渴望產生疑問；這些論述企圖將傳統中國描述為一個無可爭議的整體，產生了中國只有一種意義、具有不間斷的連續性，和經典確鑿無誤等印象。古代中國的要角據信表達了要嘛是這個理想或德行，或是那個傳統和思想陣營；我們的文獻宣稱它們只有一種口徑、在傳達事理時沒有雜音，且並不罕見地展現出一種姿態：它們是恆常不變的，對社會中所有階級的每一個人而言如此，無論使用中國的哪種語言皆然，其特性穿越數世紀、覆蓋地理意義上「中國」領土的每個角落。

我想反思的第一個假說，是認為神農的土地僅僅是農民土地的觀念。這一形象在整個中國史上周而復始地被強調，在毛澤東時代亦然。一說主張在傳統或「儒家」社會，各行各業被整齊地劃分等第，學者和農民分別以其腦力與汗水位居帶道德色彩的生產社會的頂端，工匠、商賈和其他以農業以外手段創造財富的人則被置放在社會的邊緣。伴隨農業而來的是理想的均質社會，即孟子所言、在井田制下每個家庭都和諧相處，為公共利益而共耕（《孟子·滕文公上》）。連篇累牘的文獻常以此為據，責難逐利的行為和市場交易的道德原則，並讚頌古代在商業上的單純質樸。

沒有人能否認農業在早期中國哲學論辯中的核心地位，或無視於它在古代及今日中國所反映的經濟現實。但任何人只要走在中國一般規模城鎮的大街上，無論在帝制時代甚或今天，他很可能會被一些教科書中的說法給弄糊塗了：書上說儒家思想的內蘊是反對交易和企業的理念。這樣一個在大多數哲學、政治和宗教論述中崇尚節儉、節制、遺世獨立和物質上利他主義的社會，怎

11 Angus Graham, "The Nung-Chia 'School of the Tillers,'" in Graham, *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rpt. Taipei, 1986), pp. 67-110.

12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132，圖版（簡347-353）見頁51-51；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303-304。

13 見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修務訓》（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630；Anne Birrell, *Chinese Myth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9. 亦見 Paul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11-16, 132。

14 《周易正義·繫辭下》。

麼同時又是一個所有社會、政治和宗教交往都涉及商品交換（包括早期祭祀使用的青銅器、近代的勞績薪金、或是當代商業活動中表示友好的贈禮）的共同體呢？經典中關於這些主張的基礎真的牢不可破嗎？

我的答案應不難想見。出於時間的考慮，我僅能在眾多反敘事（counter narratives）中舉一個例子，針對此議題提供不同的看法。有些諷刺的是，我要舉的例子是子貢，孔子最著名的學生之一。子貢在孔門之所以特出，原因之一是他能在不失去物質利益的情況下實踐道德行為（這是《論語》中經常受到推崇的理想）。正是子貢建議孔子「去告朔之餼羊」（《論語·八佾》），並讓孔子說出自己是待價而沽的「美玉」（《論語·子罕》）。在司馬遷編撰的〈貨殖列傳〉中，子貢商賈的身分，與孔子思想的傳播有直接關係：子貢先是跟隨孔子學習，然後靠著屯積與買賣各種商品，他在孔門弟子中「最為饒益」。其他人「匿於窮巷」時，子貢則「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到之處的君王「無不分庭與之抗禮」。¹⁵

司馬遷隨即總結，正是子貢「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在這段敘事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是透過最有成就的商賈門徒的中介，才真正成功地找到「市場」。我們也能看到，儘管在經商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作為商賈門徒的子貢在德行的奧林匹克（the Olympics）中也絲毫沒有妄自菲薄：正如孟子滿心嚮慕地指出的，子貢和其他孔門弟子為孔子服完三年喪後，又一個人回到葬地，「築室於場，獨居三年」（《孟子·滕文公上》）。

以上種種告訴我們，孔子對商業的隱喻絕不陌生。另外，如果儒家思想真是一種因為商人沒有生產力而將之打入社會底層的意識形態，那儒家思想得以在帝國境內傳布是拜孔門弟子出身的商賈之助的觀點，很可能會

教人坐不安席。

從農業的迷思出發，我可以進入另一個頗成問題的假定，即在神農的田園中樂其生業的農民，總是和他們的自然環境和睦共存。根據這個觀點，傳統中國提供了有別於西方的另一種框架：不同於西方的環境倫理，在人與環境的關係上，中國較不強調對自然的支配與利用。¹⁶

看到環境史家徵引《孟子》中「牛山濯濯」的例子（《孟子·告子上》），將中國放進持續開展的、關注人與自然環境如何互動的敘事中，著實令人振奮。¹⁷ 與此類似，捍衛動物權的人士也可以在經典中找到滿足其論點的其他故事，如《孟子》中梁惠王不忍心看到牲牛害怕得發抖，故下令禁止以牛血塗飾典禮的鐘（出自〈梁惠王上〉）。這裡常被忽略的是，梁惠王其實是以羊取代牛……）。

但物理與歷史的證據表明，除了臥居山林的道家隱士和頌揚自然的山水田園詩、畫，古代中國的人也敏銳地察覺到了自然環境可能帶給人類社群的艱困處境。在各式各樣的材料中（如秦朝法律與明清方志），經常可見因人類活動而造成的環境惡化和相應的補救措施。乾旱、饑饉、洪水和疾疫可說是各種文字記錄裡頭常見的主旋律，遍見於哲人和技術官員的奏章、宇宙論論述，以及詩歌和醫學作品中。我們時常看到的是，同一份文獻往往既描繪了一個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共存、四季和順的烏托邦社會理想，又同時包含許多因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災害與困境的淒涼事例。

這是一個尚待充分開展的迷人故事，也是歷史學家、文獻學者與科學家可以有巨大創獲的領域。近期的研究指出，從公元前5世紀以迄漢末，單單長江中游的濕度與年均溫便有顯著的變化。¹⁸ 根據文字記錄，中國學者推測，在魏晉南北朝（3世紀初至6世紀末）不到

15 英譯見 Burton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Han Dynasty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rev. ed.), pp. 433-454。

16 可參考 Mary E.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 eds.,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Norman J. Girardot, James Miller, and Liu Xiaogan, eds., *Daoism and Ecology: Ways within a Cosmic Landsca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 例如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p. 21-24。

18 見陳業新，〈戰國秦漢時期長江中游地區氣候情況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2:1（2007）：5-16。亦見陳業新，《災害與兩漢社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四百年的時間內，中國飽受天災與疾疫之苦，這些疫災的發生頻率達 21%，即約每四年七個月便爆發一次。這個頻率隨政治穩定與否而變動，應該不單純是巧合而已。¹⁹

學者很輕易地便會將上述結論化約成統計數字，忽略奏章和正史的冰冷記載背後的人類故事。但這些故事亟待撥雲見日！我可以分享一個公元前 2 世紀初的悲慘故事。這個故事尤其令人動容之處，在於它出自一個被販賣為傭奴的貧窮小男孩。竇少君四、五歲的時候由於家貧，被人綁架並販賣為奴，「傳十餘家」後才在今天的河南省洛陽附近為一個私營的冶鐵業者工作。竇少君和同伴們砍伐林木以為燃料之用，並「暮臥岸下」，就近休息。一天晚上「岸崩」，除了竇少君，其他的百餘名「臥者」都被壓埋在土石下，命喪黃泉。²⁰

人們可以在不同地方尋求庇護：如孟子關於牛山的經典著述，或是莊子所謂不材之木方得終其天年的寓言。²¹ 李約瑟讓我們認識到鼓風爐的科技及其鋼鐵的重要性；但必須透過年幼的竇少君的敘述，我們才得以見證森林砍伐的真實面貌，以及在神農的田園中勞動的芸芸眾生所挨受的困境。我希望這也要寫進我們的故事中。

拜那些在神農的田園上耕耘土地的人們所賜，一場貨真價實、波瀾壯闊的觀念革命，正顛覆著我們對於中國過去的理解。直至三十年前，有些學者還表達出一種期望，即絕大多數古代中國的文獻與考古遺存能得到敘述與描繪，語文學（philology）和文獻批判的活兒因而可以輕易地擱置一旁，讓位於偉大觀念的闡發。如今，我們可以說這些學者弄錯了。中國的當下處境如何促成我們激進地重新考察中國過去呢？有的人也許會說，其中一類最深刻的例子，源於某種程度上的機械化的偶然性（mechanical contingency）。中國各地迅速的現代化和

土木工程，已經讓許多東西重見天日，且它們的數量還在不斷增加，包括出土的簡帛文獻、新見墓葬，以及各種新的工藝製品。這些材料將有待未來幾個世代的學子，以無數篇博士論文規模的研究加以處理。

過去四十年出土的各種新材料太多了，不可能在這裡進行回顧。光是文字材料便包括商代甲骨文、青銅銘文、法律文書、行政記錄、占卜書、曆法、醫書、哲學文本、詩歌、墓葬記、注疏材料與烹飪手冊等。考古挖掘出的新文本與新物件有如不間斷的洪流，其分量令人吃驚，它們的重要性更是難以估計——學者可以透過它們檢證傳世典籍。這些新材料的影響觸及我們工作內容的方方面面：從文本編輯到詮釋迄今未見的畫像主題，以至於增進我們關於日常生活的知識。最近的里耶秦簡便和今晚的主題有所關聯：考古人員在里耶的一口井裡發掘出超過 37000 枚簡牘文書（湖南省龍山縣，簡牘年代約為公元前 222-208），其中便有一些祠祀神農的記載。²²

解讀、整理這些新材料，讓學術社群得以充分利用它們，有待全職的專業分工為之，而我們尚得證明我們仍能像之前一樣，完全掌握所有新出材料。現代科技如建構中的許多資料庫固然提供了幫助，但它也大大擴充了材料的量，並使我們面對的任務更加棘手。令人苦惱的問題又時不時地浮上檯面：是要以語文學本身為目的考察文本，還是將語文學當作工具以解答其他學科提出的問題呢？伴隨著新材料的發掘，訓練研究者，使他們嫻熟中國語文學的技藝（文字、聲韻、訓詁以及歷史語言學），仍是今天的當務之急。

這使我想起卓越的前任漢學講座教授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在 1964 年一篇標題生動的短文〈獨自為漢學鼓掌打氣〉（“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中做出的高瞻遠矚的評論。他在文中強調，語文學和文

19 龔勝生、葉護平，〈魏晉南北朝時期疫災分布時空分布規律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2: 3（2007）：5-20。

20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49〈外戚世家〉，頁 1973；Anthony J. Barbie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p. 99。

21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 20〈山木〉，頁 667。

22 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7），頁 194-196；張春龍，〈里耶秦簡祠先農、祠窖祠隄校券〉，《簡帛》第 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93-396。

獻批判技巧的培養，仍是「任何想專業地處理中國過去的學者的訓練中所不可化約的根本要素」。²³ 我認為杜希德教授無疑是正確的，我想補充的是，秉持這種精神，語文學、文獻批判以及不同學科對材料的處理之間，必須展開對話。我們只要花一個早上，快速翻覽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第四任漢學講座教授哈隆（Gustav Haloun, 1898-1951）的著述，便能清楚了解一件事實：探索古代中國時，我們無須在歷史學、哲學、人類學和宗教學等綜合性研究之外另立一座語文學的長城與之扞格相對；相反地，我們的研究將可因對話而相得益彰。²⁴

語文學的課題迫使我匆匆踏進一個最重要的聖域，它關乎中國許多歷久不衰的統一與連續性的假定：文字（漢字）。如果我們從地理環境迥異的中國各地出土的文獻中學到了什麼，那便是另一個我們在教科書中所見、但必須訂正的主張，即秦始皇在二十年內統一文字、制定正字標準，而這一結果經過了兩千年直至今天都屹立不搖、無可爭辯。

沒有人會質疑秦朝推動了影響深遠的文字改革；但古文字學也不斷顯示，當時許多人使用的漢字，在字體結構上仍有很大的變異性。有證據表示，文字的統一更像是個漸進而紛沓的過程，也許要遲至唐代（公元 7 至 9 世紀）才告完成。²⁵ 若對傳世文獻竭澤而漁，我們也能清楚看到，儘管官僚行政文書中存在著字體的一致性，古代中國的人（今日亦然）其實是透過各種口語和方言摸索前進的，這些口語、方言往往是地域性的，有時還在語種上有顯著差異。在我們的文獻中，語言認同的建構甚至不是古人念茲在茲的課題。²⁶ 除了有時可

見，描述楚人講「楚語」、齊人講「齊語」的例子外，我們經常看到的古代人表述陌生語言的方式，和前面提過的劍橋高桌上中國人「說話像在唱歌」的刻板印象更為相近：在中國文獻中，外國語言被描述為「鳥獸語」、「夷談」或「反舌」。

中國文字的統一毫無疑問在帝國形成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這種書寫文字也持續存在於今天的中文世界，並提供一個獨特的語言黏著劑。但我們的中國史寫作如此特意標舉漢字的連續性並賦予其重要性，可能也是因為史家多致力於漫長的帝制中國史上那些呈現社會、政治、文化和地理統一性的時期。這種對連續性的主張，可能部分地反映了古今的中國正史傳統，並因此忽視了中國史上的政治分裂和地域、語言的多樣性，與一致、和諧和協同相比毫不遜色。有趣的是，新出土材料有時仍能用以滿足關於連續性的類似假設。他們是這樣論證的：既然新材料能為傳世文獻中所流傳的特定傳統背書，並肯定其真偽及年代，帝制時期的書寫傳統及其文字記載，想當然爾應看成是傳遞中國過去的唯一正確載體……。

親愛的來賓，我希望你們能同意，對研究中國的歷史學者而言，現在正是趣味橫生的時刻。中國史學者很快便得仰賴同行的人類學家，以理解另一個時下關於古今中國之連續性的主張。孔子及其思想的復興與改頭換面，是今日中國的一個引人入勝的發展，我們仍距離這個現象太近，以致無法評價此運動的影響。²⁷ 孔子塑像和孔廟如雨後春筍在校園和城鎮中巍立；讀經班為了商業社群而設立；還有北京奧運開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舞

23 見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964), p. 110. 文章篇名的中譯，參考自賴瑞和〈追憶杜希德教授〉，《漢學研究通訊》26: 4 (2007.11) : 27。

24 關於哈隆教授的貢獻，見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p. 152-163。

25 見 Imre Galambos, *Orthography of Early Chinese Writing: Evidence from Newly Excavated Manuscripts* (Budapest: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2006)。

26 見 Wolfgang Behr, "To Translate' is 'to exchange' 譯者言易也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the Terms for Translation in Ancient China," in M. Lackner and N. Viltinhoff, eds.,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4), pp. 199-235。

27 一個有幫助的描述，見 Sébastien Billioud and Joël Thoraval, "Jiaohua: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hina as an Educative Project," *China Perspectives* 4 (2007), pp. 4-20。

蹈編排：張藝謀安排了上百名舞者扮演儒生，揮舞手中的竹簡《論語》。我們之中有些人，也許會對一個想法感到顫慄不安，即在不久的將來，大學生研讀中文的興趣，可能是來自今日市面上各種不同的卡通版《論語》。我在猜想李約瑟是否會喜歡這個想法，不是因為這一發展將迫使我們把卡通放進閱讀書目裡，而是由於它更清楚地表明了一點：我們必須持續不斷地教授劍橋學生中國的原典文獻及其脈絡。

三

是時候做個總結了。迄今為止，我已透過實例指出，有些關於連續性與一致性的根深蒂固的假設，可能會遮蔽研究者的眼睛，讓人忽略中國社會的若干複雜面向。這些假設包括四民社會、農民的理想、文字、語言的一致性；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連續性與一致性；歷史敘事的一致性和經典文本的連續性等。這裡提出的疑問與難題當然不可能在今天、或由我個人來解決：它們需要許多學者群策群力、一起投入。

在劍橋，我們希望認識中國的所有型態與面貌：包括經典和線上詩歌、藝術、物質文化與日常語言、中國的作家和哲人、不同宗教與芸芸眾生，涵蓋城市和鄉村，包羅中國本土與大陸之外的華人。這個任務仰賴跨學科的洞見與靈感、持之以恆的訓練計畫，以及爲了與在知識經濟上火速成長的中國亦步亦趨所需的、有增無減的人力與學術資源。

在我們感到高興的同時，也請讓我表達我的一點警覺。自威妥瑪、翟理斯以至李約瑟以來的數十年，關於中國的學術研究確已取得長足進展。即便如此，在學術界，中國研究的命運仍難免飄搖。

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不斷增長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讓我們的許多大學意識到中國長期以來被小覷了。大學因而產生研究中國的需求，並將之設計成人文通識課程的一環。然而，在學術界和政府的某些角落，這意味著中國之所以成爲課題，純然是爲了理解當代中國的需要，或是僅在中國與西方有接觸之際，中國史才值得研究。誠然，如我們在許多作品中所見的，文化接觸的時代總是能吸引不少中國研究者：如佛教成長、興盛的魏晉南北朝；耶穌會士等傳教士活動的明末清初；與西方帝國主義碰撞的 19 世紀中期以降；當然，還有身處全球化浪潮中的當下。我想，只要別忽視中國數世紀以來文獻有徵的過去，不要將中國穿鑿進任何片面的世界史敘事，不要因上述兩點而把中國懸浮於歷史的真空中，前述文化接觸的諸多研究領域儘可繼續成長茁壯。

話說回來，漢學家也有責任研究帝國的燦爛輝煌，研究處在危機的年代、與外隔絕的中國。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應持續探索掩蓋在西方觀點下、形塑階段中的中國之歷史、語言與文學；或考察中國與中亞、東北亞與東南亞而非歐洲或現代西方世界接觸的全球化時刻。又或者，可以考慮單純意味著跨越長江流域的全球化時刻。我有時不免吃驚的是，今天的漢學家們，會時不時地爲了如何說明中國值得研究而感到困擾，特別是站在中國的語言、文學自有其價值的立場，以及爲了推展人類知識而研究中國者。以知識本身爲目的將持續作爲劍橋發展中國研究的宗旨。講座教授一職的資金捐贈及其成立，讓我與同儕的信念更加穩固：較過去任何時刻尤甚的今天，關於中國人文學術的全面研究，應在學術界取得恆常不易的地位。這應是李約瑟所希望的，也是我們所樂見的願景。